

明治维新

The Meiji Restoration

【英】威廉·G.比斯利 著
张光 汤金旭 译



刘东 主编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明治维新

【英】威廉·G.比斯利 著

张光 汤金旭 译

The Meiji Restoration

刘东 主编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治维新/(英)比斯利(Beasley, W.)著;张光,
汤金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12
(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07856-8

I. ①明… II. ①比… ②张… ③汤… III. ①明治维
新(1868)—研究 IV. ①K313.4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7818 号

The Meiji Restoration by William G. Beasle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72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sup.org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9-205

书 名 明治维新

作 者 [英]威廉·G.比斯利

译 者 张 光 汤金旭

责 任 编 辑 周晓阳

装 帧 设 计 刘亭亭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1 304 毫米 1/32

印 张 15 插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7856-8

定 价 40.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西方日本研究丛书

这又会是一个卷帙浩繁的移译工程！而且，从知识生产的脉络上讲，它也正是上一个浩大工程——“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姊妹篇，也就是说，它们都集中反映了海外学府（特别是美国大学）研究东亚某一国别的成果。

然而，虽说两套书“本是同根生”，却又完全可以预料，若就汉语世界的阅读心理而言，这后一套丛书的内容，会让读者更感生疏和隔膜。如果对于前者，人们还因为稟有自家的经验和传统，以及相对雄厚的学术积累，经常有可能去挑挑刺、较较劲，那么对于后者，恐怕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难以置喙。

或许有人要争辩说，这样的阅读经验也没有多少不正常。毕竟，以往那套中国研究丛书所讲述的，乃是自己耳濡目染的家常事，缘此大家在开卷的过程中，自会调动原有的知识储备，去进行挑剔、补正、辩难与对话。而相形之下，眼下这套日本研究丛书所涉及的，却是一个外在文明的异样情节，人们对此当然只会浮光掠影和一知半解。

不过，设若考虑到这个文明距离我们如此之近，考虑到它在当今国际的权重如此之大，考虑到它跟传统中华的瓜葛如此之深，考虑到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产生过如此严重的路径干扰与路径互动，那我们至少应当醒悟到，无论如何都不该对它如此陌生——尤其不该的是，又仅仅基于一种

基本无知的状态,就对这个邻近的文明抱定了先入为主的态度。

还是从知识生产的脉络来分析,我们在这方面的盲点与被动,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长期政治挂帅的部颁教育内容所引起的。正如上世纪50年代的外语教学,曾经一边倒地拥抱“老大哥”一样,自从60年代中苏分裂以来,它又不假思索地倒向了据说代表着全球化的英语,认定了这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国际普通话”。由此,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以及从事所有其他非英语国家研究的学者,就基本上只能来自被称作“小语种”的相对冷门的专业,从而只属于某些学外语出身的小圈子,其经费来源不是来自国内政府,就是来自被研究国度的官方或财团。

正因此才能想象,何以同远在天边的美国相比,我们反而对一个近在眼前的强邻,了解得如此不成正比。甚至,就连不少在其他方面很有素养的学者和文化人,一旦谈起东邻日本来,也往往只在跟从通俗的异国形象——不是去蔑视小日本,就是在惧怕大日本。而更加荒唐的是,他们如此不假思索地厌恶日本人,似乎完全无意了解他们的文化,却又如此无条件地喜欢日本的产品,忽略了这些器物玩好的产生过程……凡此种种,若就文化教养的原意而言,都还不能算是完整齐备的教养。

与此同时,又正因此才能想象,如此复杂而微妙的中日关系,如此需要强大平衡感的困难课题,一旦到了媒体的专家访谈那里,往往竟如此令人失望,要么一味宣扬一衣带水,要么一味指斥靖国神社。很少见到这样的专门家,能够基于自己的专门知识和专业立场,并非先意承旨地去演绎某些话语,而是去启迪和引导一种正确的阅读。

那么,除了那两种漫画式的前景,更广阔的正态分布究竟是怎样的?总不至于这两个重要邻邦,除了百年好合的这一极端,就只有你死我活的另一极端吧?——由此真让人担心,这种对于外来文明的无知,特别是当它还是极其重要的近邻时,说不定到了哪一天,就会引发代价惨重的、原本并非不可避免的灾祸。确实,要是在人们的心理中,并不存在一

个广阔的理解空间，还只像个无知娃娃那样奉行简单的善恶二元论，那就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作为一介书生，所能想出的期望有所改善的手段，也就只有号召进行针对性的阅读了，并且，还必须为此做出艰苦的努力，预先提供足够的相关读物；此外，鉴于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终将越来越走向民主化，所以这种阅读的范围，也就不应仅限于少数精英。正是诸如此类的焦虑，构成了这套丛书的立项理由——正如在上一套丛书中，我们曾集中引进了西方自费正清以降的、有关中国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眼下我们在新的丛书中，也将集中引进西方自赖肖尔以降的、有关日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

我们当然并不指望，甫一入手就获得广泛的反响和认同。回想起来，对于大体上类似的疑问——为什么满足理解中国的精神冲动，反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最新成果？我们几乎花去了二十年的不倦译介，才较为充分地向公众解释清楚。因而，我们现在也同样意识到，恐怕还要再费至少十年的心血，才能让读者不再存疑：为什么加强理解日本的途径，也要取道大洋彼岸的学术界。不过我却相信，大家终将从这些作者笔下，再次体会到怎样才算作一个文化大国——那是在广谱的意义上，喻指学术的精细、博大与原创，而并非只是照猫画虎地去统计专著和论文数量，而完全不计较它们的内在质量。

我还相信，由于这套丛书的基本作者队伍，来自我们二战时期的盟国，所以这些著作对国内读者而言，无形中还会有一定的免疫力，即使不见得全信其客观公正性，至少也不会激起或唤醒惯性的反感。此外，由于这些著作的写作初衷，原是针对西方读者——也即针对日本文化的外乡人——所以它们一旦被转译成中文，无意中也就有一种顺带的便利：每当涉及日本特有的细节和掌故时，作者往往会为了读者的方便，而不厌其烦地做出解释和给出注释；而相形之下，如果换由日本本土学者来处理，他们就不大会意识到这些障碍，差不多肯定要一带而过。

不待言，这面来自其他他者的学术镜子，尽管可以帮助我们清洗视野和拓宽视角，却不能用来覆盖我们自身的日本经验，不能用来取代我们基于日文材料的第一手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不能用来置换中日双边的亲历对话，以及在此对话中升华出来的独自思考。而最理想的情况应当是，一旦经由这种阅读而引起了兴趣和建立了通识，大家就会追根究底地上溯到原初语境去，到那里以更亲切的经验，来验证、磨勘与增益它们。

无论如何，最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力的上升和自信的增强，中华民族终于成长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它在整个国际格局中所享有的内外条件，使之已经不仅可以向其国民提供更为多元和广角的图书内容，还更可以向他们提供足以沉着阅读和平心思考这些图书的语境。而这样一来，这个曾在激烈生存竞争中为我国造成了极大祸害的强邻，究竟在其充满曲折与陷阱的发展道路上，经历了哪些契机与选择、成功与失败、苦痛与狂喜、收益与教训，也已足以被平心静气地纳入我们自己的知识储备。而借助于这样的知识，我们当然也就有可能既升入更开阔的历史时段，又潜回充满变幻偶因的具体历史关口，去逐渐建立起全面、平衡、合理与弹性的日本观，从而在今后同样充满类似机遇的发展道路上，既不惮于提示和防范它曾有的失足，也不耻于承认和效仿它已有的成功。

我经常这样来发出畅想：一方面，由于西方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剧烈冲击，也许在当今的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区域，能比我们东亚更像个巨大的火药桶了；然而另一方面，又因为长期同被儒家文化所化育熏陶，在当今的世界上，你也找不出另一块土地，能如这方热土那样高速地崛起，就像改变着整个地貌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一样——能和中日韩三国比试权重的另一个角落，究竟在地球的什么地方呢？只怕就连曾经长期引领世界潮流的英法德，都要让我们一马了！由此可知，我们脚下原是一个极有前途的人类文化圈，只要圈中的所有灵长类动物，都能有足够的智慧和雅量，来处理 and 弥合在后发现代化进程中曾经难免出现的应力与裂痕。

此外还要提请注意，随着这套丛书的逐步面世，大家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早先那套连续出版了一百多种，而且越来越有读者缘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其知识创化的原生态中，实则是跟这套“西方日本研究丛书”相伴而生的。作为同一个区域研究的对象，它们往往享有共通的框架与范式，也往往相互构成了对话基础和学术背景。而由此也就不难联想到，尽管西方的区域研究也在面临种种自身的问题，但它至少会在同一个地区谱系中，或在同一个参考框架下，把中日当作两个密不可分文明，来进行更为宏观的对比研究——这就注定要启发我们：即使只打算把中国当作研究对象，也必须蔚成一种比对日本来观察中国的宽广学风，因为确有不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只要拿到中日对比的大框架下，就会昭然若揭，迎刃而解。

最后，由于翻译这套丛书的任务特别艰巨，既要求译者通晓英文，又要求他们了解日本，也由于现行的学术验收体制，不太看重哪怕是最严肃的翻译工作，给这类唯此为大的学术工作平添了障碍，所以，对于所有热心参赞此项工程的同侪，我既要预先恳请他们随时睁大眼睛，也要预先向他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并且——请原谅我斗胆这样说——也为他们万一有什么“老虎打盹”的地方，预先从读者那里祈求谅解。当然，这绝不是一个“预先免责”的声明，好像从此就可以放开手脚去犯任何错误了。可无论如何，我们想要透过这套书提供的，绝不是又有哪位译者在哪个细节上犯下了哪类错误的新闻，而是许多译者经由十分艰苦的还原，总算呈现在图书中的有关日本文明的基本事实——无论知我罪我，我还是把这句老实话讲出来，以使大家的目力得以穿透细枝末节，而抵达更加宏大、久远和深层的问题！

刘东

2009年8月16日于静之湖·沐暄堂

译者的话

英国学者 W. G. 比斯利于 1972 年出版的《明治维新》，可视为西方史学界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典范之作。该书出版一年后即获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费正清奖，费正清奖一年只奖励一本被美国历史学会认定为有关 1800 年以来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历史的最佳历史著作。

比斯利生于 1919 年。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本科学位后，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英国海军服役。期间，他获得了在美国海军语言学校学习日语的机会。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参与了对南太平洋岛屿日本战俘的审讯工作。战争结束后比斯利来到横滨，在横须贺海军基地和位于东京的英国联络团参与了盟军对日的占领工作。因此机缘，比斯利选择了日本研究作为自己终身的学术追求。

比斯利于 1950 年以《英帝国与日本之开国，1834 - 1858》(1951 年出版)为题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并于 1954 至 1983 年间在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担任远东史教授。从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比斯利发表了大量有关晚期幕府和明治维新的学术论文，于 1955 年发表了《日本外交政策文件选编，1853 - 1868》，而他于 1963 年出版的《日本近代史》更是在西方知识界享有盛誉。因此，当他于 1972 年出版《明治维新》时，

有学者评论道,这是“一个集四分之一世纪多的研究和反思的成果”。比斯利于1967年被任命为英国科学院院士,在1983年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出版了多部著作,《日本帝国主义,1894-1945》(1987)、《现代日本的兴起》(1990)、《日本遭遇野蛮人:在美国和欧洲的日本旅人》(1995)、《日本经验》(1999)和自选集(2001)。比斯利于2006年去世。

比斯利的《明治维新》是一部史论结合的历史著作。它的导论以简明的方式讨论了到1970年为止的有关如何解释和评价明治维新的性质、地位和历史影响的主要学说以及代表学者和著作。然后,它大体上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依次探讨了维新政治的各个阶段。第1至4章展现了日本政治的中心如何从幕府政权的问题(内忧)转向对外政策的问题(外患),而这依次导致了“改革的大名”(第5章)、“不满的武士”(第6章)、攘夷运动(第7章)、攘夷的失败(第8章)以及恐怖主义的失败(第9章),在这诸多尝试失败后,日本最终选择了维新运动(第10章),其后的四章探讨了明治新政府的主要改革。在结论部分,比斯利总结道,日本明治维新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他认为,贯穿幕府末期到明治初年诸多政治事件始终的“红线”,是从对外来威胁的意识走向国家认同的意识,并以要求国家统一和独立的方式表现出来。伴随这一进程的,是因经济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大量出自中下级武士的“有才之人”(man of talent,“才子”)进入日本的统治阶级。而正是这些“有才之人”选择了“明治维新”,主持了明治初年的改革。所有这一切等于一场革命吗?比斯利明言他不愿意使用革命一词来描述明治维新的性质,因为在明治维新运动中,武士扮演了统治的角色,而在运动结束之后建立的明治政权中,他们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在明治社会中,“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元素,在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旗号下共生共存。鉴于此,比斯利反对把明治维新定性为“资产阶级”、“农民”、“绝对主义”或“右翼分子”运动。

中国是比斯利写作这部著作过程中不时观望的参考系。它的导言

也是全书的第一句话是：“在 19 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来自西方扩张的威胁和压力。”这些威胁和压力使两国都陷入政治和军事的危局，对两国的传统政治文化都形成了致命的挑战。两国对这些威胁和压力的最初的反应也多有相似之处：“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敌视、文化上盲目自大，不情愿地承认自身在‘财富和力量’的上的劣势”。然而，这些反应在中日两国所引发的后果却大相径庭。在前者那里，对内保守主义联手，对外节节退让，直至王朝覆灭和革命到来；但在后者那里，“以夷制夷”却获得了成功，一系列建立“现代”国家的政策的实施使它最终成为一个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强国。作者写道，“于是，与日趋贫困、内战不已的中国不同，日本走向了帝国与发展工业之路”。紧接着这段话，他斩钉截铁地写道：“明治维新乃是这一反差的核心所在”。

或许，仅仅冲着这句话，这本书就值得中国读者驻足一览。

张 光

2012 年春天于厦大校园

致 谢

在过去的 15 年间,我一直——至少是断断续续地——就本书所涉及的话题进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人数之多,我在这里远远无法妥当地列举出来。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我已在别的场合表示了我的谢意。因此,在这里我不打算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除了少数例外),而是以更加一般的语言描述我的谢意。

首先,如果没有许多日本学者的帮助,这本书的写作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著作和论文(尽管它们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因为他们愿意与我讨论问题,回答我的提问,在史料上进行指导。我特别需要感谢我经常工作于其中的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的朋友,其中的几位,尤其是森田次郎教授和小西四郎教授,从我开始研究日本史起就是我的导师。另外,我还要向那些在我访问高知和鹿儿岛时提供了帮助的朋友表示特别的谢意,他们是那么慷慨地让我占用他们的资源和时间。

在英国,我也得到各种帮助:来自档案学家和图书管理员(在公共记录办公室、英国博物馆和东方与非洲学院);来自我所在的学校的同事和学生,他们贡献了问题和讨论(有时仅仅是表示不解,从而迫使我必须澄清我的思想);来自东方与非洲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它提供了财政和行政上的支持,并给予我充足的学术假。对于以上种种,我都不胜感激。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她不仅以多种耗时费力的方式帮助我的工作,而且,还不得不与我的工作共同生活,这是一件比什么要求都大的要求。

W. G. B.

伦敦

1971年12月

相关用法解说

日文姓名是按通常的日文形式给出的，即姓在前名在后，如 Matsudaira Keiei（松平庆永）。许多名有多种读法，例如，Keiei 也可读作 Yoshinaga。再者，大多数藩主和武士都有多个别名，有时是同一类的，但用于不同的年月；有时则是不同类的，用于不同的场合。因此，Matsudaira Keiei 更常见的名字是 Matsudaira Shungaku（松平春岳）。对于每个人，我将在全书中使用一个名字，尽管这样做会付出时间错置的代价。部分人物可见于书后附录的“人名注释”。

在 1873 年 1 月 1 日之前，日本使用阴历来表示月和日，而年则使用年号加数字的方式表示。只要有可能，我会给出相应的格里高利历（Gregorian）的对应日期，例如，安政 5 年 6 月 19 日为 1858 年 7 月 29 日。在日文文献中只有年和月出现的场合下，我给出格里高利年，然后是阴历月份，格里高利的对等月份用括弧标出，如安政 5 年 6 月变成 1858 年 6 月（7 月 11 日-8 月 8 日）。

作者、著作名和出版日期的完整信息可见于书后的参考文献。我在注释中使用了两个缩略语：F. O. 用来指 British Foreign Office documents（英国外交部档案），BGKM 指 *Dai Nihon Komonjo: Bakumatsu Gaikoku Kankei Monjo*（《大日本古文书：幕末外国关系文书》）。

1860 年的主要藩国

这张表包含了所有 20 万石和更多石高的藩国(domains), 以及明治时期政治上重要的一些其他藩国。它们大致自北向南, 按照地理位置排列。第二列给出的是国(provinces)名, 在指代那些特别大的藩时, 通常使用它们来代替城下町(castle town)的名字。不过, 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用法, 因为藩和国的边界并不必然重合: 金泽藩涵盖了加贺、能登和越中过的大部分领地; 名古屋包括了尾张, 以及美浓和信浓的部分地区; 和歌山包括了纪伊和南部伊势; 鸟取包括因幡和伯耆; 广岛包括安芸和半个备后; 山口包括长门和周防, 合起来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长州; 鹿儿岛包括了萨摩、大隅和日向的部分地区。福井、冈山、德岛、高知、福冈和熊本各自包括了对应的国或国的大部分地区, 而佐贺只有东边半个肥前。地图上的边界大致是藩的边界, 不是国的边界。大名家名称后面括号里的字母表示大名家的类型: S 表示御三家; K 是家门; F 是谱代; T 是外样。

城下町	另名	领地估计(石)	大名家
东北本州岛			
秋田(久保田)		20.5万	佐竹(T)
盛冈		20万	南部(T)
仙台		62.5万	伊达(T)
会津(若松)		23万	松平(K)
金泽	加贺	102.2万	前田(T)
关东和中部本州岛			
水户		35万	德川(S)
佐仓		11万	堀田(F)
福井	越前	32万	松平(K)
名古屋	尾张	61.9万	德川(S)
彦根		35万	井伊(F)
津		32.3万	藤堂(T)
桑名		11万	松平(K)
和歌山	纪伊(纪州)	55.5万	德川(S)
姫路		15万	坂井(F)
西部本州岛			
鸟取	因幡	32.5万	池田(T)
冈山	备前	31.5万	池田(T)
广岛	安芸	42.6万	浅野(T)
萩或山口	长州(长门)	36.9万	森(T)
四国			
德岛	阿波	25.7万	蜂须贺(T)
高知	土佐	24.2万	山内(T)
宇和岛		10万	伊达(T)
琉球			
福岡	筑前	52万	黑田(T)
久留米		21万	有马(T)
佐贺	肥前	35.7万	锅岛(T)
熊本	肥后	54万	细川(T)
鹿儿岛	萨摩(萨州)	77万	岛津(T)

导 论

在 19 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 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来自西方扩张的威胁和压力。首先, 这些威胁和压力不可避免地置两国于政治和军事之危险的境地, 表现为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其他多次的武力冲突, 无不威胁着两国的独立; 其次, 它们还是外来文化对两国传统文化的挑战, 这些外来文化不仅在科学技术上远优于中日两国, 在许多基本理念上也与两国格格不入。中国和日本对于这些威胁的反应, 无论是从情感还是从理智上都多有相似之处: 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敌视, 文化上盲目自大, 不情愿地承认自身在“财富和力量”上的劣势。然而, 这种反应在中日两国所引起的效应却大相径庭。在中国, 儒家秩序是如此之强, 它能够遏制政治上或观念上的变革, 结果形成对内保守主义联手、对外妥协退让的局面, 最终导致(清)王朝衰落和革命时代的来临。在日本, “以夷制夷”却获得了成功, 日本人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建立“现代”国家的政策, 这个国家最终将是一个能够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强国。于是, 与日趋贫困、内战不已的中国不同, 日本走向了帝国和发展工业之路。

明治维新乃是这一反差的核心所在, 因为, 正是通过明治维新, 日本获得了一个愿意并能够实施改革的领导集团。因此, 对于日本来说, 明